

學術對談

## 徐佳士教授與新聞傳播教育

對談人：黃煜、馮應謙、朱立、潘家慶、王石番、陳世敏、  
彭家發、汪琪



徐佳士教授

### 編者的話

黃煜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

資深新聞教育大師、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前新聞系主任徐佳士教授，於2015年12月22日辭世，享壽95歲。學界上下，一時聞者悲慟、緬懷不已。

徐教授「生於憂患、長於動亂的中國」。早年就讀於政大前身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曾任南京《中央日報》記者、駐東北特派員、副總編輯。1955年赴美求學，受教於傳播研究先驅宣偉伯(Wilbur Schramm)，獲明尼蘇達大學、史丹福大學傳播學碩士學位。返臺後，1967年受邀擔任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至此先後出任政大文理學院院

長、考試院考試委員、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委員、行政院文建會委員及影劇傳播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等職。中西文明的洗禮、自由民主的薰陶、實踐工作的歷練，使其形成一套前瞻、創新的新聞教育理念，致力新聞教育17年，春風化雨、桃李爭芳，不僅促使政大新聞傳播教育展開新的篇章，甚至影響到全臺及其他華人地區大學相關教育的走向，為新聞教育界留下彌足珍貴的經驗與啟發。

本期特此彙集五篇對徐教授的追思訪談，邀請先生昔日的同事、高足，對其新聞教育理念與卓越貢獻進行回顧，悉數獨創之舉，深表緬懷之心，以勵我輩前行——

在朱立教授看來，徐師最有力的啟發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他大力引介西方傳播學理論，使新聞系所逐漸進入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傳播研究；突破當時學系門戶深嚴之格局，要求學生副修外系專業；首創「開架式」圖書室，使學子受惠；熱心促進傳媒改進，是臺灣公共電視的重要催生者。先生外表翩翩、內心坦蕩，風趣幽默被學生們昵稱為「頑皮豹」，但其「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卻在低調而簡易的言行中得到了踐實。

政大傳播學院前院長潘家慶教授，曾擔任《柵美報導》的編務指導工作，憶起先生對辦報工作的鼎力支持、對學界後輩的關心提攜、以及對SMCRE傳播理論模型的引進功績，永誌難忘。

王石番教授認為，無論是推展「集中選修制」的專家記者培養計畫，還是首創臺灣第一份社區報紙《柵美報導》之舉，均為徐師「新聞系不僅要培養記者，而且要培養專家記者」之教育理念的具體體現。徐師的「開明氣度與民主風範」，是課堂上的旁徵博引、循循啟發；是系務上的從容擘劃、開拓爭取；是社會活動的積極投入、促進改革。徐師一生，實乃「書生報國，其功偉矣！」

陳世敏教授則從徐先生對英文「專業」(profession)一詞獨具慧心的翻譯——「博腦佛心」談起，從「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倫理規範」四個方面追思徐氏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在回顧先生致力「博腦佛心」的若干新聞教育改革時，不禁設問：我們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

無獨有偶，彭家發、汪琪教授亦選擇站在傳統新聞專業價值備受挑戰的新媒體時代這一時空點來回望徐氏獨特的新聞教育理念。在他們看來，建立一個「流動性的、沒有界線」的傳播學院是徐先生的夢想。

在大家的共同回憶裡，徐佳士教授是新聞傳播界的共同導師，也是社會各界尊敬的公共知識份子。他不只改造新聞教育課程、引領學術研究風氣，更敏於筆耕，其著作《大眾傳播理論》是華文世界第一本大眾傳播理論教科書，亦著有《資訊爆炸的落塵——今日傳播與文化問題探討》、《冷眼看媒體世界》、《大眾傳媒的未來》、《符號的遊戲》等專著；他的新聞教育理念，如空谷足音，閃耀傳承至今。任憑時代轉變，但我初心不變，應是先生留給我們的永恆激勵與紀念。

### 馮應謙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傳播與社會學刊》是傳播學的重要期刊，本刊除了開拓傳播前沿研究外，也兼具記錄華人傳播研究歷史的責任。本期《傳播與社會》的學術對談特別邀請幾位國際知名學者追憶一位華人傳播研究的先驅學者。他就是朱立、汪琪、陳世敏、王石番和潘家慶眼中形容的篤信自由、溫文爾雅的「一代學人」徐佳士老師。

正如這期專題文章所記載，徐老師在六十年代辭去中央日報要職，全職投入新聞教育，曾擔任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和新聞研究所所長，在任期內，奠定了臺灣新聞教育的課程內容和框架。在任期內，積極捍衛新聞自由和編採自主，也以專業新聞教育推動新聞專業化。

在教學方面，徐老師有教無類，提攜後輩，今天華人傳播學的大師不少是他的徒弟和徒孫，他們都承傳了徐老師的新聞教育抱負、精神和執著。

在學術方面，他可算是華人學者中最早把西方的傳播理論和傳播模式帶入中文世界的人，沒有徐老師的功勞和努力，傳播學絕對不能植根華人地區成為一門重要的學科。

轉眼間，徐老師所建立的新聞教育到現在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可

惜，正如汪琪老師所說，今日的媒體似乎離開徐老師所提倡的專業的新聞理念和與核心價值愈來愈遠。他的學生在本期學術對談中，也提醒和勉勵現在所有的傳播教育學者，我們的任務並沒有因為傳播科技發展而停止，反之，我們未來的工作變得更艱鉅。

最後，也讓我記下我的感想。我自己也是朱立老師的學生，因此也間接算是受徐老師啟蒙，我也感到無限光榮。今天我們有機會為新聞和傳播教育機構工作，也作為學刊的編輯，都感到自己有責任延續徐老師的使命和願景。

## **Professor Chia-Shih Hsu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Discussants: Yu HUANG, Anthony Y. H. FUNG, Leonard CHU,  
Jia-ching PAN, Shih-fan Steve WANG, Shih-min CHEN, Chia-fa  
PENG, Georgette WANG

---

### **Abstract**

Our journal, *Communication & Society*, aims not only to introduce new frontier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but also to record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history. This special issue is dedicated to a maj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 Professor Chia-Shih Hsu. He taught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in the field, including including Leonard Chu, Jia-ching Pan, Shih-fan Steve Wang, Shih-min Chen, Georgette Wang and Chia-fa Peng, all of whom have described Professor Hsu as both a freedom fighter and a gentle scholar. According to their writings, Hsu is a kind mentor who is always willing to guide young scholars, many of whom now embody Hsu's spirit and mission.

After resigning from *Central Daily* in the 1960s, Professor Hsu took up the position of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Director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As a pioneering journalism educator, he founded the fundamental curriculum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s a practitioner, he has always defended press freedom and advocated professionalism in journalism.

Professor Hsu was also a pioneer in localizing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and communication models. Without his initial efforts, today's mature and establishe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Chinese society would not have

emerged. Nevertheless, despite decades of work by Hsu and his followers, Georgette Wang has shown that various forms of journalistic malpractice—sensationalism,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self-censorship, to name but a few—remain common. A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advanced, journalistic values appear to have moved even farther away from the ideals upheld and promoted by Hsu.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uang, Y., Fung, A. Y. H., Chu, L., Pan, J.-C., Wang, S.-F., Chen, S.-M., Peng, C.-F. & Wang, G. (2016). Professor Chia-Shih Hsu an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6, 1–30.

## 篤信自由民主的君子學者

朱立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前院長、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教授

老師誇讚他是好學生，長官認為他是好部屬，學生推崇他是好老師，傳播學同行說他是位具有前瞻視野的學者，社會尊敬他是位講原則、為大多數人福祉著想的知識份子。無論做甚麼，他都全力以赴，盡力做到最好。他就是最近以九六高齡去世的徐佳士教授，周圍的人對他的看法正是他為人的忠實寫照；他最有力的啟發不在他的「言」，而在他的「行」。

徐佳士老師的老師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創辦人馬星野，馬星野生於憂患，長於動亂的中國，朱自清、林語堂和威廉斯 (Robert Williams) 等曾是他的老師。朱自清是散文家、溫州市浙江省立第十中學的國文老師，林語堂是學者、幽默大師、廈門大學的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威廉斯教授是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創院院長，也是馬星野留學美國時的老師。在大師的教導和影響下，馬星野磨礪了思考方法，練就了典雅簡潔的文筆，開闊了包容的胸襟，他擁有中華文化的底子，也受到了西方自由與民主政治的薰陶。

徐老師也生於憂患，長於動亂的中國，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受到了馬星野的感召，更受到了如麻國事的衝擊。他非常愛國。大二便輟學從軍，在昆明為空軍當翻譯。中西文化的洗禮，自由民主教育的薰陶，使馬徐師生倆都愛國，但卻不是盲目、無原則的愛國。馬星野主持《中央日報》，秉持的是新聞自由的原則，因此他奉行「先日報，後中央」。抗戰勝利後，徐老師大學還沒畢業，便在《中央日報》實習，且擔當東北特派員的重任，在副總編輯、政大新聞系學長陸鏗領導下，報導國共內戰。徐老師先是在東北採訪，後在南京報導第一屆國民大會，有國大代表認為國軍在東北的軍事潰敗係陳誠將軍錯誤戰略所致，因此主張「殺陳誠以謝國人」。徐老師據實報導，馬星野受到了層峰的責難與壓力，但依然極力保護學生，始終沒有透露新聞的作者，而且在知道是徐佳士所寫的報導後，馬老師非但沒有責難，反而在私

底下誇讚徐佳士「做得好」。徐佳士記者敢據實下筆，陸鏗採訪主任敢扛責，馬星野社長敢承擔，可見三人對新聞自由都有深厚的信念和勇氣，而且還有默契。

《中央日報》遷臺，徐老師是副總編輯，負責國際新聞和編譯，1967年，因為老師既有實務經驗又曾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留學，他被任命為政大新聞系系主任，他視野廣而遠，秉持人文思想和自由主義精神來辦系、設課。他相信同事、相信同學，首先，新聞系開架式的圖書室成了校園的創舉，我當時是新聞所的碩士生，是身受其惠的學生之一。自徐老師主持新聞系系政起，大學部同學必須副修，他相信，術科外得有專長知識做基礎，才能處理包羅萬象的新聞，應付瞬息萬變的傳媒生態和社會，與時並進。在今天，有這種看法一點都不稀奇，但50年前，大學各學系門戶森嚴，在重實務術科的新聞系，這更屬於根本性的大變革，但徐老師堅持信念，默默地溝通而終於辦成了。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也是徐老師的學生，他說得好：「徐老師做人處事總是在繞指柔的春風中展現，他的溫柔的堅持是我們的典範。」(楊倩蓉，2010)。

1967年到1969年我在政大新聞所就讀，選了徐老師的「大眾傳播理論」，老師著述、講課一如他的老師宣偉伯(Wilbur Schramm)教授般深入淺出、循循善誘，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以身作則地教導了我們要謙虛。除了他剛出版的《大眾傳播理論外，老師還指定我們閱讀從*Mass Communications,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和*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等書選出的英文論文，介紹我們認識了當時如日中天的宣偉伯和正當紅的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上課時，老師頗幽默，他常雙腿交叉斜倚講檯，老師在課外也同樣幽默，看到新聞系女生在政大校慶運動會上身手不凡，他曾改編系歌，說「新聞系的女生壯如山，新聞系的男生美如水」。不過，當年我們這些研究生頗為拘謹，傳統到祇敢在背後淺笑，倒是大學部的學弟妹們為他取了形意兼具的「玩皮豹」綽號，還訂做了一個老師和「玩皮豹」各自雙腿交叉斜倚講檯兩旁的偶像給他當生日禮物。退休後，老師的幽默風趣不減當年，同學們問候他，他會假裝不識，用英文反問：Who are you? 問候師母，他則反問：Which one? 臧國仁教授和我都有同樣的經歷。

徐老師是翻譯高手，譯介了麥克魯漢的傳播理論，我也狗尾續貂，翻譯Richard Kostelanetz「電子叢林中的高僧」投稿《新聞學研究》，介紹麥克魯漢。後來我奉命翻譯美國的〈電視守則〉(Television Code)，其中有combat一字，我當年英文功力仍在初級階段，窮搜枯腸也祇能生搬硬套，全靠老師拔筆修正。徐老師也是位提供「售後服務」的好老師，學生出國，他是推薦人；不少學生結婚，他是證婚人；內子和我結婚，徐老師是介紹人。在威權時期為同學出國擔保還曾給他帶來麻煩，但他仍舊為所當為，樂於助人，做老師該做的事。新聞系系友李金銓教授也是徐老師的學生，他在《新聞中的政治，政治中的新聞》一書中說新聞研究所所長曾虛白、新聞系系主任徐佳士和客座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新聞所副所長貝克(Richard T. Baker)身材高大，是政大新聞館的「巨人」。我非常幸運，曾親灸三位師長的教誨，和他們有不同程度的互動，深知他們是有所為也有所不為的知識分子，品德和身材都同樣高大的君子學者，不僅外表翩翩坦蕩，內心亦然。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傳播與發展是開發中地區心所嚮往的國家大事，徐老師在教授「大眾傳播理論」時，宣偉伯教授的《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是本重要參考書。在他引介、倡導或主持下，臺灣在上世紀後四十年的研究，諸如家庭計劃、傳媒與社會責任、社區媒體等都離不開這個主題。這固然是老師在史丹福大學受教於宣偉伯教授的影響，也是他認為學須致用的體現。2009年，第一屆星雲大師真善美新聞貢獻獎頒給徐老師100萬元獎金，表彰他在新聞傳播教育上的成就和貢獻，老師自掏腰包交了稅，把獎金全數捐給了新聞系。無論做人或處事，老師總是為所當為，不喜張揚，不過他的典範就在他默默的言行中傳承下去了。

系統譯介美國的傳播理論外，老師也關心傳播學在本土生根，無論主持系務或研究，他都是前瞻、創新的，祇要對傳播學的發展有幫助，他都全力促成。1978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開啓中國傳學的研究，翌年4月，政大新聞系和傳播研究中心在政大召開第二次的研討會，廣邀社會、心理、政治、歷史、傳播、文學、哲學、人類學等科的學者與會，擬定了研究大綱，這便是1997年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的藍圖。後來傳播研究中心和朱傳譽教授合作，搜集資料，

準備將計劃再向前推進一步。在這些計劃中，老師投入而不居功。我當時也是參與者之一，才知道老師的謙讓。

徐老師曾是臺灣公共電視的一位重要催生者，他誠心誠意希望將來的公視獨立超然，不受或少受政治及商業利益的影響，但當行政院刪去公視草案中的董事任命辦法和經費時，老師毅然辭去籌備委員，拒絕背書他不贊同的條款。退休後，老師對社會、對傳媒的關心絲毫不減，他寫專欄、出書，針砭時政、批判濫用自由的傳媒，也為社會對傳媒的不當攻擊辯護，他熱心參與改革，雖得罪人亦再所不惜。徐老師熱心公益，凡是對社會有益，能改進傳媒，他都樂於出力，除了參與籌備公共電視外，他曾擔任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的委員，媒體改造社的召集人和卓越新聞基金的首屆董事長，「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儒家精神就在他低調而堅毅的言行中得到了落實。我認識老師近50年，從來沒見過或聽過同學說他疾言厲色，他總是那麼不急不徐，彬彬有禮。徐老師總為他人設想，是位能不麻煩人就不麻煩人的謙謙君子。2007年5月20日，政大在圓山飯店舉行創校八十周年餐會，直到零時才結束，多虧了曾是老師學生的馮建三教授再三堅持，徐老師才勉強搭了馮老師的便車返新店家。鄭瑞城教授也是老師的學生，曾在政大校內外與老師有數十年的互動，他說得貼切，認為老師沒有師生尊卑之別，祇是永遠把人當人看。徐老師有這種人格特質，學生敬愛他也就不足為奇了。

2014年6月27日下午，陳世敏、彭家發、汪琪、鄭瑞城、李金銓、顏嘉琪、曲和怡與我等老學生到新店去探望他們敬愛的老老師，徐老師和師母很高興，老師當時已不良於行，靜靜地和公子坐在桌旁聽著師母和學生天南地北、左一言又一語地闲聊。黃昏時分，老學生們辭出，大夥兒沒說甚麼，但幽沉的臉色已難掩心中的不捨。

2015年12月22日，徐老師安詳地走完了無愧的一生，留下了謙謙君子熱愛人生、教育、自由和民主的典範！

## 參考文獻

- 楊倩蓉(2010)。〈徐佳士老師：新觀念的創造者〉。《提燈照路的人》(頁55)。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 傳播理論的引進與徐師

潘家慶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前院長

提起徐佳士老師，我在政大唸書時（民國四十四到四十八年），徐師還沒有回到政大。徐師應該是五十五年前後回來。他從美國回來時，我已服完兵役。五十一年，幸有機會得洪鈞師允諾，讓我返校做助教，負責「學生新聞」的編務指導工作，後來「學生新聞」易名「柵美報導」，成為大臺北地區的社區報紙。

徐師雖沒有直接教過我，工作之餘，見到他行禮如儀後，他總是親切地與我寒暄一陣，令人印象深刻，總是：「家慶，最近有甚麼大新聞啊！」「你們上期那篇特寫，不輸一般日報的報導，見到作者時，請代為致意。」「其實你的功勞也不小啊！」

我這個小助教聞之，不禁心中暗喜，心想徐師對「柵美報導」如此看重，我再把這喜訊傳給作者時，他說：「真的？能得本系大師的關注，真叫人樂死了，下次見他時一定要深深一鞠躬，謝謝他的鼓勵……。」

徐師就是這樣的人，對所有人都親切無比，知道其名，總是先稱其名，再與你說話，在那個師生對立的年代，套句學生的俗語，可真是「稀有動物」。

徐師做人溫文儒雅，大獲人心，直接受教於他的學生更是頻頻直呼，真是「一代學人」。正因為如此，見他時，不再只是打招呼，常常一談，就是三、五分鐘。

有了這個基礎，我這個小助教，膽子也逐漸大起來，我與徐師間似乎再沒距離。一次在餐廳遇見老師，他就要我坐下，表示要請客，我可是有些局促不安，他見我如此，更加溫暖如冬陽。談話之間，我不禁說出我心底的需求。我知道到如今，這種事常會在校園中出現。「老師，可否介紹一兩本好書，給我讀讀？」

「要找書不要找我，應該自己先想想，你需要甚麼？缺少甚麼？目的為何？然後到圖書館尋尋覓覓，開架式的圖書館就有這個好處，只

是多花一點時間而已，久而久之，單從找書過程，你就可獲益匪淺……」

我想，當時我一定面色難看，他一見我如此，立即展開笑顏，「家慶，別着急，慢慢來，一個年輕人，必須先訓練自己的找書能力，在尋尋覓覓的過程中，你會獲得不少意外的收獲，千萬別氣餒」。

這時，我稍稍釋然，心想，這不就是一套大學生自我訓練之道。常人所稱「經師」、「人師」，他的婉拒，其實是大學教育中一套找書、讀書的自我訓練過程。得此良師，心願足矣！

後來，他接新聞系主任，依然沒有直接干預我的工作，只是在每隔一段時間的教師集會中，才個別詢問工作上的難題。「學生新聞」或「柵美報導」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財務上的困難，當我提出了問題，他總是全力幫忙找學校，甚至找校長，向他們爭取「柵美報導」的基本生存權。偶爾也會親跑印刷廠與老闆討價還價，每次大體都能解決問題，免得我們小助教，夾在中間，困擾難安。

助教工作之餘，我總得想想自己前途，於是邊忙工作，邊寫論文，準備升等。惟當時氣氛下，各方面阻力特多，學校負責的人，就是不喜歡你升等，他們心裏覺得，你升等了，助教、行政再找何人？他們巴不得你一輩子幹行政，做助教。他們的理論是，人人想往上爬，學校行政、助教事誰來做？

幸好，徐師不是這一款型人物，我個人也不信邪。幸得徐師力挺，使我終於完成論文，獲得通過，又設法讓我開課，成為名符其實的講師。當然過程是緩慢的，但有徐師力挺，並協助開課，使我名符其實成為授課講師，附帶處理若干系務，這使得後來的路，愈來愈寬闊，徐師之功，可說是我有力的後盾。

徐師個人專長，是他自美國回來，帶來的新聞傳播新事物——傳播理論。他回來前，新聞系師生老在新聞、做報紙、廣播中打轉。(那時電視剛開始以娛樂的姿態大獲人心)。徐師回來後，我們才聽到一些「傳播理論」的知識。不知不覺中，我們理解了SMCRE的傳播理論模型。

所以說，臺灣學校裏的「傳播理論」，因為徐師的引介，使我們知道一則談話(人際傳播)，或新聞傳播(大眾傳播)如何由傳播者，經過

重要關卡(媒介)，才能傳到他的受者(眾)，至於各人反應或所得，則因各人的企求、素養、德行、與傳播者隱性或顯性的動機或希望，透過層層的障礙而有不同的效果。

這整個傳播過程，包括傳播者在甚麼主客觀因素影響下，發出訊息；在怎樣的氛圍下，經過層層關卡，在甚麼氛圍下，到受播者的眼、耳、乃至於整個身體細胞活動情況下，接受到對方傳來的訊息；在不同的受播者身處環境、氣氛影響下，獲得怎樣的音訊，以及不同心理、生理與環境氣氛影響下，得到如何確定的訊息，從而作不同解讀與接納，然後作出反應與不反應。

這套過程其實就是徐師在他著述與講課中所強調的「傳播過程」。這個過程至少包括傳播者(S)，說了些甚麼(M)，藉着怎樣的通道(C)，傳播給甚麼人(R)，結果會得到如何的反應或效果(E)。後來的人歸總這個過程，就稱之為傳播模式(或模型)。

多年來，大致結論是，這個SMCRE模式，雖然看起來很簡單，然而過程中每一個元素，牽涉的問題很多，且極為複雜。單就傳播者所發出的訊息而言，就包括了「人」與「訊息」兩個極為複雜的源頭。「人」本身跟他所處的「環境」，又有數不清的影響因素，如人格、傳送訊息方式，包括眾多的複雜的背景與性格。所以說，模式是簡單的，但每一個因素，不論是人或訊息，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與眾多。其他如傳播過程中，每一個元素，皆如此錯綜複雜、難以用簡單語言說得清楚、明白。

徐師把這個理論模式，帶回臺灣乃至於中文世界，後來的人不斷學習鑽研、修正，乃有今日的「傳播理論」。大師將原型引入國內，乃有我們這些後繼者不斷鑽研、學習與解釋、發展，乃致於演進與變化，最後形成一門「學問」。傳播理論就此枝開葉散，不能不歸功於徐師的引進，他的功勞是引進這門學問，讓後來者有機會不斷鑽研、發展。不論今日徐師身在何處，作為一位新學問的引進者，學問的本身與徐師的引進者身份，永垂不朽，值得後繼者永誌不忘。

## 春風化雨典範長存 ——敬悼徐佳士教授兼憶徐師與政大新聞教育

王石番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前院長

去年12月24日下午，我得知徐佳士老師不幸病逝，內心非常難過，淚眼婆娑中，猶憶1970年2月初幸蒙徐師和政大新聞研究所各位老師垂教，開始在辦公室工讀，經過二年六個月，到1972年7月獲碩士學位，於八月被聘為講師，協辦所務；1975年8月先生榮膺政大文理學院院長，仍然和我談論公事，來往不斷。我從二年半的工讀到1976年7月底，奉准赴美留學止，六年六個月，和他朝夕相處，恭聆教言。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完成學業，回到政大任教，從徐師遊近50年，獲益良多！噩耗傳來，徐公對我耳提面命的慈祥音容，猶在眼前，如今人天永隔，從此難再親聆教，更加深我的景仰和永懷！

徐師教學與推動系(所)務，矢勤矢勇，竭智盡忠；致力研究，敏於筆耕，著作很多，為系爭取研究資源，認真負責，不遺餘力；投入社會服務，書生報國，其功偉矣！

佳士教授1957年自美學成歸國以後，一方面在中央日報工作，也寫專欄文章，一方面在政大新聞系所兼任廣告學、比較新聞學等課程。1967年11月榮任新聞系主任時，毅然辭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職位，他主持新聞系務二年後，同時兼任新聞研究所所長六年。到1975年7月，由於辦學認真、領導有方，績效良好，政大新聞教育更是蜚聲中外，乃於是年八月榮膺政大文理學院院長，主持院務直到1983年7月滿八年，奉准休假一年，致力於指南山麓的高等教育凡17年，洵設教，春風化雨，桃李爭芳。

在政大新聞系學生的心目中，徐教授是很有新觀念的學者，他從1967年11月到1975年7月，八年間為政大新聞教育引進新觀念，厲行新作法，讓政大新聞系、新聞研究所邁出傳統，逐漸與世界接軌。他推動系所務與課程的創新，對政大新聞教育的影響至深且鉅，四五十年來仍令人津津樂道。徐師擔任政大新聞系主任以前，在新聞業界服

務二十多年，經驗豐富，所以接掌系務以後，鑒於新聞工作者的語文表達很重要，認為新聞記者要有足夠的文學修養，文字才會優美，文筆才會流暢，表達才会有深度，所以除了有系列性的新聞採訪寫作課程外，另闢「現代文選」，並列為必修課、強化學生的通識，增廣人文社會科學的觀念與思維，並加強語文能力的訓練。由於是小班制，多位老師投入，內容多元精彩，也因而促進師生的互動更為密切。

佳士先生早年留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與史丹福大學，對新聞傳播實務與教育的趨勢，有深切的體認。他認為新聞系不僅要培養記者，而且要培養專家記者。因此，新聞系課程之外更要靠政大人文、社會、商學等充沛的教育資源，激勵新聞系的學生發展第二學術專長，以便未來步入新聞傳播的職場時，以鞏固新聞學術，同時早已累積另一學術專長。所以，在他接任新聞系務二年後，於1969年秋，實施課程修訂的決議，推展「五選一集中選修制」的專家記者培養，要求學生從政治、經濟、國際關係、企管、社會或法律等學門中，任選一門，修讀20學分，加強副修專精養成。

政大《學生新聞》原本是政大新聞系在臺灣復校後的實習報紙，創刊於1956年，內容主要是大學校園的新聞。徐師接掌系務後，於1973年10月12日將該報改名為《柵美報導》成為報導木柵、景美地區的社區報紙，報導該地區的動態，報導內容更廣，是從校園走出去的社區報紙，也是臺灣開風氣之先的第一份社區報紙。

佳士教授自己認為他青年時期在政大所接受的新聞教育是自由主義的新聞教育，後來負笈美國雙子城密西西比河畔，在民主自由學風的薰陶下，更能隨時以開闊的心胸追尋學識的奧妙。他碩長的體型，風采盛儀，溫文儒雅；上課時，常面帶笑容，娓娓道來上課的內容，掩不住其開明的氣度與民主風範。由於在中央日報擔任編譯有年，饒富時代意義的英文資料接觸很多，視野廣遠縱深，思維迎向時代潮流，這些個人修養常反映在系務推動與教學活動上。

他上課時，理論的講解和問題的分析之餘，喜歡用啟發式的教學法，援引多方面的例子來做比較，觸動學生的思想，鼓勵學生問問題，引導學生表達不同的意見，學生也常在質疑解惑中，破迷開悟。他平常和學生走得很近，關心他們的學業和生活，參加許多學生活

動，瞭解學生的心理，學生參加校內外的比賽，他更為重視，尤其，每年五月政大校慶運動會，他帶著新聞系師生繞著運動場，為比賽的學生加油，為系啦啦隊喝采，系裏女生得獎多，所以他讚揚新聞系女生壯如山，男生美如水！

身為系主任，徐師上班甚勤，一年四季政大新聞館的晨曦常映照他伏案批公文的身影，而落日餘暉輻射著該館大門階梯泛紅一片時，他仍然佇守斗室，為系務操心，堅守崗位，從容擘劃。他認為大學是傳遞和創造知識的殿堂，充實圖書設備至為重要，應該充分運用學校每年編列購置新書的經費預算，增補英文傳播書刊，迎頭趕上學術研究潮流，於是督促新聞研究所講師，定期勾選美國《新聞學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和《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的書評書目，經他核定後，再用英文打字，送請購買，在他所長任內增購英文新聞傳播專書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接任新聞系主任不久，發現來新聞館圖書室走動的人不多，借書者不多，書櫃不開放，借書手續傳統繁瑣。他認為圖書館的功能是服務師生，營造讀書風氣，促進知識交流，圖書館的設立原本有其學術、社會和文化等意義，所以圖書館的管理應是基於鼓勵師生常來借閱的民主原則，於是新聞系採用開架式陳列，讓師生得以徜徉於書架之間，先瀏覽書籍內容，再決定是否借閱。

徐教授非常瞭解美國新聞傳播教育的現況與發展趨勢，在他領導新聞系、所期間，社會科學學術極為重視定量研究，他故而延請別系師資來新聞研究所講授統計學，教導研究生用高等統計處理實証研究資料，後來更延攬有博士學位的歸國學者來所專任，講授統計學和電腦在傳播研究的應用等課程，深化研究生的定量研究途徑訓練，啟發理論與方法論的關聯性，提昇研究生定量方法的理論與實務之認識。

此外，新聞所當時更規定碩士論文要聚焦於社會調查法、內容分析、和實驗法等任選一種來完成。這項規定更是促使探究社會心理學堂奧的新聞傳播研究能具體落實，學生熟稔學術論文的研究過程，沉潛於專題研究的觀念，從而積極投入實証研究資料的蒐集、分析、驗證、和論文撰著，對於強化政大新聞教育品質，貢獻良多。

一般而言，高等教育學府是學者專家匯聚，職司傳道、授業、解

惑，並探索宇宙奧妙，開啟知識泉源。駐守臺灣新聞傳播教育重鎮的徐師當然早已懷抱這些理念。徐主任的方塊文章很有傳播學術的概念。他出版《大眾傳播理論》，有系統的介紹並闡釋美國大眾傳播學者的研究與學術經驗，可讀性高，是國內探討傳播理論的第一本著作。1972年，他的《大眾傳播的未來》發行了，接著，他仍然以身作則，孜孜矻矻致力傳播研究。政大新聞系本來就蓄積純厚的研究能量，教師陣容中，有從事世界新聞史、中國新聞史、新聞評議與報業自律、社會科學方法論、社會調查、新聞採訪寫作等研究而卓然有成者，徐師更帶領系所同仁，竭力開拓研究資源，樹立研究特色，開創傳播行為社會調查研究，這在當時臺灣新聞傳播教育學府中是很難得的。而行政院新聞局、國科會、亞洲協會等有研究計畫相挺，《臺灣地區民眾傳播行為研究》就是在他的國科會計畫主持下，多位同仁參與研究，該項研究計畫後來成為階段性，曾延續多次。當時臺灣社會科學學術界如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學門類似研究也蔚然而興，政大新聞所巍然迎向學術潮流，的確不易！《臺北市家庭主婦對家庭計畫宣傳的反應》、《臺灣地區民眾家庭計畫傳播模式：通道、訴求、與反應》等結合當時政府政令宣導的多項研究，都蘊含時代與社會意義。另有臺灣主要報紙犯罪新聞的內容分析，和臺灣主要報紙科學新聞的內容分析等專題，也都是國科會的研究計畫，都是系所同仁合作的心力結晶。

1970年代是臺灣政經、社會面臨轉型的關鍵階段，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的呼聲響徹雲霄，多元的政治氛圍逐漸瀰漫全臺，經濟發展呈現一片生機，社會變遷牽引高等教育的變。政大新聞教育也在徐所長的策劃下，邁向朝氣蓬勃的學術旅程。他一向鼓勵師生出國深造，在他的任內，有多位同仁分別前往紐西蘭基督城堪特柏利大學、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等留學，多位從美國著名新聞傳播學成歸國的青年學者，應邀來系所任教，也有幾位國際知名的美國新聞傳播學者貝克(Richard Baker)、葛迺敦(Charles C. Clayton)、繆里爾(John C. Merrill)、恩美瑞(Edwin Emery)等都是哥倫比亞、南伊大、密蘇里、明尼蘇達等大學的資深教授，著作很多。他們在政大任教一年或一學期不等，開的課程是配合新聞所的需要和他們各自的學術專長，但都有英文寫作的課。為著促進亞洲新聞傳播區域性學術文化交

流，多位香港、韓國的學者來所演講並和學生座談。亞洲大眾傳播研究與資訊中心(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re，簡稱Amic，後改名為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於1971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校園成立時，徐所長也參與該機構的活動，該組織是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其宗旨是促進亞洲地區媒介與傳播的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廣大層面的發展，它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區域性媒介與傳播研究機構，成立以來都在鼓勵媒介善盡倫理與社會責任。徐師推薦同仁參加該組織的研討活動，都希望開展系譽，在區域中不孤立。

佳士先生處處與人為善，熱心參加社會公益活動。臺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於1968年到1973年延請徐主任擔任秘書長；1974年，他接受該會之委託，和同仁共同完成「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無線電廣播規範」、「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範」等。他多次當選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委員，參與推廣新聞自律活動。1971年夏，政府當局鑒於社會正在轉型，為廣開言路，接納不同意見，大學校園舉辦研究會，讓青年學子得以建言，政大新聞研究所奉令與行政院新聞局合辦國家建設研究會新聞研究會，會議地點在臺北木柵政大新聞館禮堂，與會者都是各大學研究生和高年級大學生，新聞系所教師同仁協助主持小組研討會，徐佳士所長策劃會務，折衝樽俎，盡心盡力，至為辛勞。1972、1973年等連續三年的暑假都各辦一次，會期不長，研討題目頗廣，新聞系、所響應政府號召，不畏艱難，不卑不亢，終能圓滿達成任務，可見其學養崇博，勇於任事的學者風骨！

綜觀上述，徐佳士教授不愧為典型的經師、人師，先生之德山高水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風範長存，驟聞殂謝，不勝悲悽！老師，您九十六年燦爛人生旅程，種福施恩，受惠者眾，願您在天之靈安息！

## 博腦佛心：重返新聞專業初心的路途有多遠？ ——追思徐佳士教授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sup>1</sup>

陳世敏

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退休教授

梁啟超談到小說的群治功能，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論述，他說：

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著龜而決也。（梁啟超，1902）

將「小說」一詞易為「新聞」，可能更貼切！新聞跟小說一樣，有如空氣、日光、水無所不在，其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待近人麥克魯漢主張「傳媒就是環境」一說提出，梁啟超早已洞悉傳媒之社會影響力。我們觀察梁氏許多關於報章雜誌的相關言論，可以斷言：就社會影響力這一點，梁氏如果在世，同樣會主張「新聞/傳媒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因其含有穢質毒性，日日夜夜，食息者將不免輕者憔悴萎病，重者慘死墮落。

這一脈相承的傳媒社會思想，流傳很廣，主調就是「公共利益」，認為傳媒首要的服務對象，是社會，是大眾。不僅公共傳媒系統要服務社會，商營傳媒系統也要同樣在服務社會——只是經營方式不同，可以以廣告營利而已。哲學家杜威曾經提出以傳媒取代教育系統的構想，覆按年代，大約在梁啟超前後。可以說，服務「公共利益」是傳媒的天賦職責，也是它所以構成社會重要體制的價值所在。

梁啟超與杜威不約而同看到的這一點，日後在普立茲和威廉斯手上，形成了新聞教育的哲學根源。曾經是黃色新聞大師的普立茲，晚年痛改前非，認識到傳媒必須成為社會正面力量的重要性，乃捐助鉅款，成立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設立基金獎勵優秀記者。他認為記者的責任重大，必須像醫師、律師一樣，接受專業教育。

而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1908年（比哥倫比亞新聞學院早了兩年）在

密蘇里大學成立，其首任院長威廉斯，給學生的第一課即是「我堅信新聞事業是一種神聖專業」。培養專業，無疑是新聞教育的核心價值，也是始創者所以致力於新聞教育的初心。

這個思想，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十九世紀末現代報業形成之前，美國報業經歷了政黨報業和聳動主義報業，尤其是後者，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痛定思痛，社會菁英逐漸認識了報業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重要性，要讓記者像醫生、律師一樣，以專業來服務社會。這就是為甚麼美國大學新聞學院，模仿法學院、醫學院，是以 professional school 的姿態，而不是以 college 形式出現的原因。二十世紀初正值美國國會通過教育法案，廣設州立大學，新聞學院趕上了這一波風潮，是在專業學院實用技藝的大學教育理念下成立的。

如眾所知，近代中國大學新聞教育受到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和密蘇里新聞學院教師們來華講學的影響，可以推測：新聞專業的理念中國大學並不陌生。但直到馬星野從密蘇里大學回到政大新聞系任教，才明確地揭櫫了新聞專業的教育理念。

馬星野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時，仿威廉斯「報人守則」，手擬「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闡釋新聞專業的內涵，其中第十條明白寫著：「吾人深信：新聞事業為領導公眾之事業，參加此業者對於公眾問題，應有深刻之瞭解與廣博之知識……」其他條文涉及查證事實、謹慎報導、公正評論以及記者個人操守等專業倫理規範。

前述新聞專業的濫觴，始於近代報業之前的報業黑暗時代。我們可以說它是一種矯枉的設計，也可以說它是報業與時俱進的轉身蛻變。無論如何，專業主義的理念是奠基於個人報業的，是俗稱記者為無冕之王思維之下的產物。細看專業的內涵，從要求記者擁有豐富的知識到要求記者操守高潔，在在顯示：我們現在所瞭解的新聞專業，在二十世紀伊始的美國新聞界和新聞教育界，基本上是新聞學術兩界迫於社會壓力所做的矯枉設計，它意外給予了近代報業一個華麗轉身的機會，專業主義的義理，成為近代報業價值觀的冠冕。

當然，專業不是鐵板一塊。日後的報業發展中，專業與其所在的報業現實和社會環境之間，不斷拔河，也不斷自我修正其內涵。新聞

專業義理逐漸納入了傳媒組織、傳媒產業、社會與政府等相關的型塑力量。

本文無意、也不能析辨新聞是否為一種「真正」的專業，礙於傳媒學術兩界對傳媒專業問題討論不多，本文借用職業社會學概念，將專業特質分為「專業知識」、「專業自主」、「專業組織」、「倫理規範」等四項（羅文輝，2013），來追思徐佳士教授的新聞專業事蹟，包括記述他作為一個記者和作為一個教育者的相關行誼。筆者認為，貫穿記者徐佳士和教師徐佳士的，正是新聞中的專業。

### 關於專業自主

根據徐佳士自述，他的外勤記者工作生涯，始於在校時參與系上自辦的社區報紙「南泉新聞」（在重慶南溫泉）。政大新聞系畢業後進入南京《中央日報》當記者，跑社會新聞，1947年擔任東北特派員。當時的社長是馬星野，採訪主任陸鏗。

徐佳士回憶他在南京《中央日報》工作的日子時說：「馬老師要把報紙辦成『每日的百科全書』，他的新聞理論、做事方法及對新聞的執著，給我很大的啟發。」

報紙既然是每日的百科全書，為社會所需，有如空氣、日光、水，這樣的辦報願景，毫無懸念地相對要求工作人員必須具備極高的專業條件，這是普立茲和威廉斯重視新聞專業教育的初心。

馬星野從密蘇里帶回來新聞專業的觀念。從相關的資料，包括《陸鏗回憶錄和懺悔錄》，可以覆按：當時《中央日報》編採部門享有相當高的編採自主權，社長只負責報社的經營，不管編採部門的日常編採作業，有如「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青年記者徐佳士，在《中央日報》體驗了高度自主的編採環境——也就是當今新聞界所謂的「內部新聞自由」，從來是專業新聞人所一心嚮往的工作環境。南京《中央日報》創造了中文報業歷史上的一個洞天福地，成為那時代的領導報紙，並非無因。徐佳士的親身經驗是：

有一次我採訪國民大會，會中有一位東北代表大聲指責陳誠把東

北丟了，主張「把陳誠殺頭」，我就據實寫了這條新聞，而陸(鏗)主任居然也把它登出來。後來我才知道，馬老師因此事受到當局很大的壓力，但他沒有處罰我，也不讓我知道。陸主任也為我「挺」了下來，自己承擔了責任。事後他才告訴我：「你差點完蛋。」(見蕭容慧，2004)

在抗戰勝利後的南京《中央日報》，編輯室自主權受到的尊重，一時無兩。報社主管甘冒危險力挺旗下記者的，徐佳士並非孤例。採訪主任陸鏗多年後承認自己心中「有日報，無中央」，新聞取捨秉持優先考量公共利益的原則，在當時實是戰戰兢兢走鋼絲上。《中央日報》是中國國民黨黨報，外界視之為國民黨喉舌、傳聲筒，譏諷它只有宣傳沒有新聞，是「有中央，無日報」。陸鏗此語，意在反駁外界對中央日報的刻板印象。

### 關於專業知識

新聞專業理念從一開始就是從記者的素質破題的。無論普立茲、威廉斯、馬星野或徐佳士，無不強調專業知識對新聞工作的重要性。細究他們所謂的「專業知識」內涵，也無例外，並非指某種專門知識，而是指博雅豐富的多方面知識，也指廣泛的常識。

英文「專業」(profession)一詞，徐佳士以慣有的徐式幽默，翻譯成中文，為「博腦佛心」。1979年，徐佳士在《中國時報》版面上以一篇題為「記者權的浮現」短文，正式提出新聞人「博腦佛心」必要性的呼籲：

新聞記者在今天自由世界盛行的制度中，地位是很微妙的。他在報社、通訊社或電臺等傳播機構的外面，十分類似律師和醫生，有著「博腦佛心」(profession)的架勢。他的腦應博，心如佛，跟製造皮鞋或依公務人員服務法而辦事的人是不一樣的。他應該具備專而廣的知識和技能，懷著菩薩心腸，犧牲小我做救人濟世的工作。(徐佳士，1979)

次年，徐佳士在《天下雜誌》的文章中，以「博腦佛心」為題，談到

臺灣社會專業團體、專業人士，包括媒體界人士，自律不足的問題。這是將專業的內涵，從知識廣博進一步擴大到自律。這裡暫時按下不表。

1967年，政大新聞系將兼任教授徐佳士改聘為專任教授，兼系主任。徐佳士於是辭去臺北《中央日報》副總編輯一職，專心政大教職。他就任系主任之後，在原本已經十分人文社會取向的政大新聞系課程，添增了許多後來他稱為「博腦佛心」的改革。

一，開設第二國文課「現代文選」，要求學生廣泛閱讀古今中外經典文獻，在課堂上做口頭報告、小組討論、文字報告；二，設立「集中選修」制度，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之外的科系中，任選一系，選修二十學分，來提高專業知識的素養；三，聘請資深媒體人歐陽醇、余夢燕，藝文傳播界林懷民、殷允芄等人來校兼課，讓學生透過課程來拓展視野和增加對傳媒實務工作的認識；四，改變實習報紙的性質，將《學生新聞》變更成《柵美報導》，使之與社區居民的生活相結合。

整體看來，這些強調基本工夫的傳統博雅教育，是徐佳士新聞教育工作的核心價值所在，與今天大學院校重視通識教育的構想不謀而合。

說到這裡，徐佳士看起來像極了一個傳統派的老學究？當然不是。徐佳士與時俱進，開風氣之先，曾在系裡新設立了廣告學、廣播電視等先進的傳媒產業相關課程。只是，他幾乎不提這一類的課程創新，好像在他心目中，這些終究是屬於職業性、工具性的「專門」課程，不是教學重點，也非關旨在服務公共利益的「專業」。

### 關於專業組織和倫理規範

典型的專業，其涉及業者的公益事項的，慣由業者的自主性組織來推動執行，而非依賴外在力量（如政府、法律）的驅迫，因此，業界是否擁存在著自主性專業組織來維護專業倫理規範，一向是判斷該產業是否為專業的指標。徐佳士在專業組織和專業倫理規範這兩方面，堪稱無役不與，是學界奇葩。

- 他於1971年出任剛成立的臺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秘書長，接受該會委託，與李瞻教授、閻沁恆教授於1974年共同完成了「中華民國報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無線電廣播道德規範」、「中華民國電視道德規範」，是日後中文傳媒自律活動的張本。
- 臺北市新聞評議委員會1974年改組為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徐佳士出任第一屆評議委員，並持續達七屆之久。
- 他想要改變傳媒體制和環境，在倡導新聞自律之外，還大聲疾呼，鼓吹制訂以保障記者權益為主旨的新記者法。
- 他支持傳媒產業成立自主性專業組織(1994)，支持臺灣記者協會成立「媒體觀察委員會」(1995)，支持無電視民主化運動(即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2000)，參與公共電視法立法，參與籌備民間公益社團卓越新聞獎基金會，並出任第一屆董事長。
- 寫了許多文章，宣揚人民知的權利，認為知的權利是基本人權，傳媒應當提供機會給民眾發聲，讓民眾得以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

「看」徐佳士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角度，筆者重溫徐教授行誼，獨鍾他的「博腦佛心」。你看，把「專業」說成「博腦佛心」，多有東方色彩呀！從記者徐佳士到教授徐佳士，我感覺到 he 始終以新聞專業作為主旋律，這在講求科技至上、績效至上的當今社會，可真是空谷足音。

令人不解的是，新聞專業自解除軍事戒嚴起，開始全面潰敗。猶記得軍閥時代，有南京《中央日報》挺身作報業的中流砥柱，戒嚴時代有記者在新聞裡「埋地雷」以規避警備總部的新聞檢查。這一切恍如昨日。至於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不是癱瘓，就是已經解體。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式微，反射出專業退場的大戲還在繼續上演中。舊記者法已於1999年廢除，連媒體主管機構新聞局也已撤銷多時，可是我們還未聽到以保障記者為主旨的新記者法(傳媒基本法)，有任何下樓的聲響。置入新聞、行車記錄器新聞、YouTube新聞構成了我們的心靈「空氣」，像塵霾，令人窒息。

不禁要問問：我們為何距離專業的初心愈來愈遠？

## 註釋

- 1 本文經本刊及作者同意，將同時在本刊及《新聞學研究》上刊登。

## 參考文獻

- 徐佳士 (1979年11月16日)。〈「記者權」的浮現〉。《中國時報》。
- 梁啟超 (1902)。〈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多種版本。
- 羅文輝 (2013)。〈新聞人員的專業地位〉。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編)，《傳媒關鍵概念》(頁151-155)。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蕭容慧 (2004)。《生涯規劃智慧王》。臺北市：未來書城。

## 徐佳士先生教育理念

彭家發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汪琪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前院長、

臺灣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名譽講座教授

1990年代開始，傳播媒體逐漸展開了一個新的局面；科技為媒體帶來的新功能，改變了媒體本身的面貌、人們與媒體互動的方式、甚至使用者本身的生活習慣。在如此巨大的變動之中，一向以媒體人才為職志的傳播教育何去何從，成為學界的重要議題。在一個人人都是傳播者、每一秒鐘都是截稿時間的網路世界裡，傳播仍然可以稱為「專業」嗎？再者，後現代思維興起之後，「客觀」「公正」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這些變化在在挑戰著傳統的專業價值。

但是對照其他國家媒體，面對同樣科技與後現代思潮的挑戰，大多數臺灣媒體似乎更進一步遠離了過去專業教育所標榜的核心理念，甚至可以說是走上了一條「反專業」的路徑。臺灣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資本案逐步掌控媒體。傳播內容不但大幅娛樂化，而且在後現代的護航之下，媒體主的意識形態，也忠實地反映在媒體的報導取向上。數十年擺脫政治干預的努力，如今面對的卻是一個「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局面。在這樣的時空點上回頭看徐佳士先生對於臺灣傳播媒體「解嚴」之後的憂慮、以及他的教育理念，令人不得不佩服先生的遠見。

先生開始擔任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的時候，是一個紙媒發達、而電視與廣告公關業初起的年代。傳統新聞學對大眾傳播新聞業的社會功能概念、組織、營運邏輯和日常諸項工作等闡釋，通常可大要地歸納在一個向度：蒐集資訊，處理資訊，向社會大眾報導，而新聞業的靈魂，就是新聞從業員——他們的神聖使命和工作。新聞從業員對社會如此重要，但人才從何而來？又該如何訓練和養成？問題簡單，數十年間學界對於「答案」，卻是爭論不休。美國新聞傳播院校眾多，學

院派的人主張學堂式教育；擢拔人材過程，以校學課程培訓在前，新聞媒體補強其能力在後。英國則多實務派，認為學生在課室所得極其有限，故而強烈主張邊做邊學的學徒制，令新進者專心一意在機構裡學習，到媳婦熬成婆後，自然出師而成為機構裡出色新聞工作人員。究竟那一個方式更易培養出人才，向來就見仁見智。

再則是培訓新聞從業員的概念和方式。長久以來，新聞業界和新聞教育界即存在應重理論抑或實用技藝之爭。新聞教育者屬學院派，認為應多講授理論方面課程，俾益於學生心智啟迪；新聞業界則希望新進員工馬上可以單兵作戰，派上用場，減輕培訓員工時間、人力和經費支出。這一議題，也同樣爭論多年。

傳統上政治大學新聞系課程設計所依循的是美式概念。1935年馬星野先生創系，把他自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所學得的模式，揉合了因地制宜、破舊立新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國同步開展；當時在系內開設「政治漫畫」，即是因應視像傳播在動盪時代中的重要性。1954年政治大學在臺復校，1967年秋季徐佳士先生被任命為新聞系系主任，不但使得該校新聞傳播教育展開新的一頁，甚至影響到臺灣、以及其他華人地區大學相關院系的走向。

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擔任記者，深受當時社長馬星野先生將報紙辦成「每日百科全書」<sup>1</sup>理想的啟發。大陸易手前在東北與南京漫天烽火中的採寫經驗，使得他對於新聞工作有了更深的體會。中央日報社隨政府播遷臺灣之後，先生轉任編譯，並在1955年赴美留學，在史丹福大學受教於傳播研究先驅宣偉伯(Wilbur Schramm)，開始接觸以社會科學角度探討大眾傳播的研究，並在回國後在政治大學新聞系兼任教職。過去的這些學經歷，使得先生在1967年辭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職務，接任政大新聞系主任時，已經對傳播教育有了自己的想法。

1960年代末起，臺灣各校的新聞系所由較為務實的新聞學逐漸進入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傳播研究，轉變可以說始自先生；然而他對新聞傳播教育的關懷是全面性的。首先，他在新聞系課程的設計上採取了雙軌式的專業培養；就是在新聞專業訓練之外，增加了「第二專長」，造就了課程上十分獨特的「集中選修」設計。先生認為記者要有很高的

語文能力和廣博的知識作為一般的基礎。但因為新聞事件和大眾傳播的種種現象十分複雜，所以還需要專門知識才能掌握。針對這些考慮，他在接任主任之後，設立了「集中選修」制度，規定學生在新聞系外，必須在法律、企業管理、經濟與國際關係等幾個主要領域裡，選修20學分的輔系課程，讓學生及早接受「專業記者」的培養。其時，新聞系隸屬文學院，大學只須修畢128個學分即可畢業；程度好的學生三年就可修完學分，但為了「捱四年」，只得放慢步伐，留些許必修課大四修讀。到後來，四年級就象一盤散沙，生活往往流於閒散。有了「集中選修」，由於外系對於修課的規定以及學分差異，新聞系學生幾乎都得修習超過20個學分，因此畢業學分大多都超過148個，但也因為這樣的課程設計，新聞系畢業生身挑兩祧——既屬新聞業通才，又可依一己興趣和能力，發展第二專長。當年步出學校，進入媒體後被派到「第二專長」領域擔任編採工作、並且表現亮眼的系友，不計其數；還有的系友繼續將「第二專長」發揚光大的，例如後來成為政治大學財稅系所主任的徐偉初、以及臺灣上市公司日電貿董事長黃仁虎都是新聞系的系友，他們後來的發展與當年「集中選修」修習經濟不無關連。

至於新聞專業教育反映在課程上，就是所謂的「第一專長」。當年新聞系規定，學生在升到三年級的時候，必須在諸如中英文編採、廣播電視或廣告與公共關係的系列課程中擇一，修習相關業務的專業技藝。新聞專長重要，但是先生並不認為需要大量課程來達到目的；一方面在校所學的專業技能，容易流於零星瑣碎，“something on everything”。何況每個新聞機構都有它獨特的企業文化，學生畢業之後，必然還會有更細緻完整的訓練。權衡之下，他認為學校學習課程中，人文社會科學薰陶比之於技藝更為急切——因此，除了人文學科四分之三以及專業課程佔四分之一的比例原則，先生又在歷史、邏輯、語意學、社會學、心理學、與法學等課程之外，加開了共八個學分、兩組上課的〈現代文選〉開課程；也即是他口中的「第二國文」。主講的除了賴光臨教授，還有當時譽滿文壇的姚朋(彭歌)先生。

技術導向的課程或許比重不大，但這並不表示先生輕忽實務上的養成訓練。上任系主任不久，他就決心將新聞系三年級「報刊實務」的「報刊」由《學生新聞》改為木柵、景美地區的第一份社區報《柵美報

導》，讓學生藉由實習走出校園，進入社區，以接受更大的挑戰和累積更豐富的實務經驗。這個態度也反映在先生對於師資的聘任上。以廣告課程為例，當時有豐富實務經驗，又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廣告學教師「一師難求」，先生毅然請了一位名重實務界、但未受過專業教育的廣告公司負責人來教公共關係與廣告組，每堂鐘點費都以演講費支付。其實無論領域為何，當時政大新聞系的師資均為一時之選，林懷民先生教授新聞英文，師範大學物理系王成椿教授跨教〈自然科學概論〉，臺視主播羅大任先生教〈廣播電視概論〉，專研電影的王曉祥先生教〈電影概論〉等等俱是例證。這樣栽培出來的新聞系畢業生，是否「但見舉止使不同」呢！

第一專長除技術導向課程之外，更重要的——或許在課程安排上看不出來，是反映在師資的選擇與系所活動上的、核心理念的部份。有回他對記者談到，「知識方面的準備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新聞記者應該有理想、應該對事業有超乎現實的抱負。」他認為大眾傳播事業可能看似開放、自由，但是是否能夠真正自由、開放是很難說的，因為有錢有勢的人往往會利用這種「表面上自由」的管道，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一個專業人員必須有能力判斷「甚麼該做、甚麼不該做」。而這種判斷力，唯有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在這個原則之下，政府仍在戒嚴，先生卻已開啟了新聞系學生思想上的解嚴。當時全系最重要的活動，是每週的「專題演講」，受邀的有民營媒體的成功典範，例如《英文中國郵報》的黃遜需、余夢燕伉儷、《中央日報》等政黨或政府媒體的負責人，著名的專欄作家孫如陵，也有倡導女權運動、後來當上副總統的呂秀蓮女士。如今回首當年，後輩只能慨嘆先生的遠見——「錢、勢」的移轉不難，維護傳媒真正的自由開放卻是談何容易。

當時新聞系的面貌相當程度反映了先生傳播教育的理念，但是夫人秦代珍女士曾經透露，一個「流動性的、沒有界線」的傳播學院才是他的夢想，早在通訊衛星與網路媒體崛起之前約20年，先生就體認到「傳播並不只有搞報紙、電視而已」；如果以職業別來分組分系，隨著科系的改變，行業界線日漸模糊，現有的劃分很快就會失效。<sup>1</sup>在這樣的認識之下，先生認為傳播可以依性質分為三種；告知/報導性的傳

播、說服性的傳播、以及美育/娛樂的傳播。依這三類性質的傳播可以分為三組或三系，之外另設印刷或電子媒體「工作坊」，提供實務訓練。無巧不巧，數十年後，筆者之一(汪琪教授)在擔任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任內，也曾經構想一個以不同傳播性質、技能專長以及輔系課程為骨幹、容許學生自己組合的課程架構。當時並不知道先生有過同樣想法，而竟有如此近似的構想，只能說先生的理想已深植我心，直到「不知不覺」的地步。

先生的門生故舊都熟知他的低調與謙和。對於人生，他要求的是「做甚麼，像甚麼」；選定了一樣事，就堅定地做下去。順著時代的潮流而行，有時候難免身不由己，但「在苦難中成長的人，活得心安理得才是最舒適的生活方式」。在這樣的基調上，無論是夢想未能實現、抑或所憂心的竟然噩夢成真，都可以坦然面對。他已交棒；真正感到遺憾的，是明知先生洞見，卻未能扭轉局勢的我人後輩！

2015年12月22日冬至清晨，徐佳士先生以高齡，於臺北新店佛教慈濟醫院辭世。他揮揮衣袖，告別凡塵，留下滿天雲彩。

## 註釋

- 1 資料來源：徐佳士夫人秦代珍撰寫的紀念文章《話今昔憶故人感天恩》。

## 參考文獻

- 周安儀(1978)。〈標準的現代新聞學人——徐佳士〉。《中國新聞從業人員群象(下冊)》(頁241)。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 蕭容慧(2004)。《生涯規劃智慧王》。臺北市：未來書城。

---

## 本文引用格式

- 黃煜、馮應謙、朱立、潘家慶、王石番、陳世敏、彭家發、汪琪(2016)。〈徐佳士教授與新聞傳播教育〉。《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6期，頁1-30。